

第三章

假設父權不存在

--性別意識形態與國家發展需求的完美聯姻？

本章以性別意識形態與國家需求作為比較，指出在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脈絡中，這兩者彼此存在著一種互相支持與互補的理論協調性，國家發展將有利於性別意識形態，也就是婦女解放的完成，而婦女解放也必須要服膺國家政策才有可能達到。在這種情況中，國家和國家所假設的婦女解放路徑存在著一致性，而且這個推行的過程並不先預設了父權的衝突，因為中共假設自我為性別中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反對資本主義、訴求婦女解放，所以不帶有父權的成份。但是「婦女受到歧視與宰制」這一個命題不應該將問題歸納到婦女身上，如果將父權這一個歧視的主詞從解放的過程中抽掉，然而父權的壓力仍然存在，那麼這份壓力是由誰來承擔？生育能夠如同中共所想像般是一項自主性的選擇嗎？

在大多數女性的生命經驗當中，生育是一件極為私密但卻又在相當程度上公開展示的事情。生育的意義是複雜的，它不只是胎兒與母體之間一種絕對而獨特的聯繫，它同時也要受到種種儀式、文化、制度的束縛，每一個不同社會都有其看待新生兒的意義圖像。生命的初始便是在這種纏繞的象徵藤蔓中展開，監督與期待。人類在追求永續繁衍的同時，制定出種種的理所當然與規定，這其中最底層的文化意涵便是出自對於未來自我的想像。一個社會要生育出全新的自己，女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不管是依賴、自主、積極、被動，很大一部份都要受到這樣一個近乎神話般的預言所管轄。

Yuval-Davis(1997)認為，婦女的生育問題經常被等同於民族再生產的保證，國家干涉了個人的生育權，控制了婦女的婚姻與性行為，也就是保障了民族基因

的純潔性。然而，在漫長的人類演化史上，民族主義的出現只是其中一個稍縱即逝的片段，我們當然有理由認為，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國家會爲了各種不同的理由對婚姻、生育與性做出控制，這些控制的動機與手段受到當時制度環境的限制，透過這些國家行爲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想要生育出的是怎樣的自己。

本文自女性主義立場論的角度出發，帶著一些既有立場與生活經驗所賦予特殊觀察與偏見，卻發現一胎化政策並不只是一件很簡化的性別偏見遺害。在一胎化政策的描述中，國家發展需求不是唯一的力量，他同時也要顧及到政策所可能涉及的性別面向，並且以中國所發展的一套馬克思主義脈絡的婦女觀加以詮釋、合理化，政策的合法性便建立在婦女的配合將會使政策的訴求達到，而政策的訴求達到也會幫助婦女的地位提昇。這種婦女與國家關係的論述看似完美無瑕，魚幫水、水幫魚，但卻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漏洞，它們都將父權等同於傳統社會的一種老舊力量，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帶有「正確」的婦女觀，因此父權將不可能存在於國家之中。也就是說其假設父權只和資本主義以及其所連帶的社會制度、特徵有所關聯，當社會主義改變了原有的制度環境時，當國家宣稱舉起社會主義的大旗時，父權的面貌也將連帶不同，或根本消失，至多，也只是舊社會的「餘孽」而已。然而，父權只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附帶的衍生物嗎？是否正是因爲過度的肯定父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關聯，這種自認爲的「清白」，讓一胎化政策中的規定直接衝撞父權時，婦女成了最大的犧牲者？因爲國家已經假設父權不存在。

第一節 一胎化政策中的國家總體目標

從一個最宏觀的角度看待所有二十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幾乎是她們所有追求與建設的目標。這樣講雖然是有些空泛，並且蘊含了一點西方中心主義的味道，但是讓我們看看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所喊出的口號：「超英趕美」、「多快好

省的社會主義建設」，不過也就是另一條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已，什麼是現代？往什麼現代化？其中的意涵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必須認知到，現代化一直是中國百年來的陰影，領導者因為對時局的判斷不同而會有不同的作法，但是其目標都是相同的，一胎化政策也是一樣。中共的節育政策是一條很長的路程，一胎化政策只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令人衝擊的歷史節點，這樣的作法是特殊的，但是在時、空上，並不是絕然的孤單。節育的態度，系統性的將人口、資源連繫起來的探討，最明確的例子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過最初開始將計劃生育由國家付諸實行的是二十世紀五零年代的印度，許多亞洲國家政府也開始對計劃生育方面給予較多的關注與資源（張風雨：1997）。1966年聯合國「關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議」中，計劃生育的概念首次進入國際建制的規範中，並且確立「人權」作為計劃生育的基礎。並於1968年「德黑蘭宣言」中，首次將計劃生育確認為一項基本人權，公民生育行為上一方面是自由的，父母可以決定子女的出生間隔及人數，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必須履行生育的義務，並且生育自由是以對社會、家庭負責為前題（紀學勇、胡燕萍：2006）。

計劃生育在二十世紀中期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對於人口眾多而普遍貧窮的中國來說，這當然是一條可以考慮模仿的道路。畢竟，不管是走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道路，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成長不能平衡，都將成為國家一項難以解決的重擔。對於許多國家來說，生育政策的控制都是為了要創造人口素質的提昇，除了強制性的執行以外，中國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什麼巨大的差別，就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說，生育控制都是現代化過程所必須的一部分，但是人口素質提昇的方法會和什麼樣的理想連結起來，這卻是我們所可以觀察的方向。

1970年代以前，中國尚未開始建立全國範圍性質的計劃生育工作（張風雨：1997）。雖然早至1956年周恩來在八大上做出「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

計畫的建議的報告」時，便已經提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的教養後代，以利民族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節制。」（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但是在種種政治鬥爭的擺蕩下，目標很難有一致的持續性。50年代的三面紅旗、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這些種種激進的、左傾的政治運動，它們的目標都是要在短時間內快速的把中國推入現代化的、已發展的社會主義天堂，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其中幾個極為短暫的裂縫曾經出現過，但是很快的就在哄鬧的鬥爭中泡沫般消逝了。計劃生育真正的付諸實行，並且在數量上達到明確的成效，這一切都是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後開始實現。

改革開放是中國邁入現代化重要的里程碑，許多論者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已經達到了許多重大目標的建設，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也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朱雲漢，2005）。改革開放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創舉，他在理論或是實際的基礎上都有過去作為他的根基，在理論上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為合法性的基礎，而在實際推展上則有過去的建設作為後盾。節育政策也是如此，要討論一胎化政策，就不能夠忽略他的連續性。

一胎化政策的正式開端是在1980年9月25日，中共黨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後，透過蔓布綿密的黨政國家機器的運作，節育工作進入了全黨、全國積極動員的階段（楊應敏、彭軍：2005）。其中提及某些群眾確實有符合政策規定的實際困難，可以同意他們生育兩個孩子，但是不能生三個孩子。對於少數民族，按照政策規定，也可以放寬一些（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另外同年9月1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也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婚姻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實行計劃生育」，並於第五條指出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22週歲，女不得早於20週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結婚的義務（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如前所述，當我們要討論一胎化政策的訴求時，現代化是一個完全不能夠迴避的重點，其他的經濟、社會、發展訴求都必須在這之下進行。胡耀邦於 1982 年 9 月 1 日，在十二大的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便指出「我國人口現正值生育高峰，人口增長過快，不但將影響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糧食和住宅的供應，教育和勞動就業需要的滿足，都將成為嚴重的問題」（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這就為一胎化政策的意義定了調，一胎化政策的意義不只是人口素質的提昇，它和其他國家最大相異之處便是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

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概念源自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取得政權與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並號召全體黨員將工作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逐漸的實施農村「包產到戶」、國營企業放權讓利，以及實驗性質的開放經濟特區等（陳永發，2000：875）。這樣的觀念發展至今，在中國幾乎是可以泛指一切現代化的建設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而一胎化政策和現代化的結合不只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體認，一直到 1997 年出版了「中國計畫生育全書」¹⁴中也再度提及「把計畫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是我們黨對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上一個很大的提高。」

（彭珮云主編，1997）一胎化政策是立基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上，這個意義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點，我們看到一胎化政策

¹⁴ 1997 年出版的「中國計畫生育全書」中，當時中國計畫生育協會會長宋平所撰寫的序中便指出，中國計畫生育工作歷史經驗有五個問題

1. 把計畫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是我們黨對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上一個很大的提高。
2. 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必須樹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思想。
3. 必須認真總結群眾實踐經驗，走出一條將計畫生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將利益導向與社會制約相結合的新路子。
4. 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將計畫生育的行政管理與群眾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5. 必須充分認識到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長期性、艱鉅性和複雜性，鍥而不捨，常抓不懈。

繼續和其他的訴求產生聯繫，像是經濟或是民族主義，但是無論如何，都是必須要以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基礎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就是從事經濟改革，因此也經常以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人口問題。1980年9月9日，鄧小平會見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執行主任薩拉斯時提及，「我們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計畫，爭取到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這個任務雖然很艱鉅，但是我們必須這樣作。否則，我們的經濟不能很好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也因此，聯合國人口基金將在1980年至1983年對中國政府提供援助（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並且，當一胎化政策帶來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濟發展時，中國的民族也才得以興盛。例如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便指出「有計劃地控制我國人口增長，使人口的增長速度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是直接關係現代化建設速度和中華民族興旺的一件大事。」（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像是這類將一胎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民族繁盛訴求牽連在一起的例子不勝枚舉。1982年3月14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堅持科學的正確的人口政策」便又提及：「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正確的政策。限制數量，就要要求晚婚、晚育、少生；提高素質，就要要求優生、優育。這兩方面的統一，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有利於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一胎化政策的政策訴求從一開始就相當明確，並且幾乎二十多年來沒有改變。2000年3月2日中共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時，其中宣稱「人口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

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¹⁵而次年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二十年來首次中共將一胎化政策化爲一個明確的國家法規，其中第一條明確的指出一胎化政策的目的。「為了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推行計劃生育，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促進家庭幸福、民族繁榮與社會進步。¹⁶」

我們可以發現，在二十多年來，雖然在許多細微之處做出修正，一胎化政策的總體目標幾乎是沒有改變過的，他最主要的目標是要藉由人口素質的改變達成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其最主要的意含是經濟的發展，並藉由經濟的發展帶來民族的富強，或者是藉由生育政策重視婦幼健康，也就將達成民族體魄的強健¹⁷。這種將人口等同經濟，國家等同民族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令人詬病之處，但是實際上推行一胎化政策之後卻帶來極爲嚴重的社會後果，爲什麼？爲什麼看似中性的政策卻在性別的生育選擇上產生了如此激烈化的影響？

是，我們開始懷疑國家。這麼明確、直接、正面的政策，爲何導致了檯面下無數的女嬰遭到殺害，以及檯面上性別人口比例的巨大落差。難道國家真的未將性別納入其思考框架中加以審視嗎？但是綜觀一胎化政策的推行演變，考量婦女問題的思緒字裡行間比比皆是，如果說充分重視婦女問題但卻仍然導致龐大的性別災難，那其中的問題出在哪裡？在評斷中共對於婦女問題的詮釋以前，我們必得先詳細的考察一胎化政策中如何處理婦女，以及其將扮演的角色。

第二節 一胎化政策中的性別訴求

¹⁵ 相關法條可參閱中國人口網。http://www.chinapop.gov.cn/rkzh/rk/rkyzy/t20040326_2782.htm

¹⁶ 參見中國婚育健康。<http://www.hunyu.net/3/detaindex.asp?id=15384>

¹⁷ 1962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便提及「認真的長期地實行這一政策，有利於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健康，有利於教養後代，有利於男女職工在生產、工作、學習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也有利於我國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中共在一胎化政策的推行過程中，曾經多次的以國務院「通知」或「決定」形式強調生育選擇應保持性別中立，要保護女嬰以及生女嬰的母親。這種宣示當然是我們觀察中共生育政策時的一個重點，它告訴我們中共認為應當要男女平等，並且在社會能夠健康發展的情況下，性別人口比例的維持也是必須的。但是除此之外，中共在八零年代推出、二十一世紀初期成法的一胎化政策中，它是否曾經使用過其他的語彙來描述婦女在生育政策中的角色？婦女在一胎化過程中究竟是積極參與亦或是被動的等待決定？

在 2001 年甫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第一章第三條指出計劃生育法的目的包括「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應當與增加婦女受教育和就業機會、增進婦女健康、提高婦女地位相結合。」這樣類似的敘述在一胎化政策的發展當中俯拾即是，它說明一胎化政策的政策動機中，婦女的利益是受到重視的，並且婦女利益的達成和一胎化政策的推行相輔相成。

將這種想法做出最明確表達的便是 1995 年江澤民在全國計畫生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他指出「我國婦女擔任著社會生產和人類自身再生產的雙重責任，要做好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必須做好婦女工作，努力提高婦女地位。」（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在中共的一胎化政策中有一種迴圈性的邏輯，婦女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式是彼此互為幫助的，婦女地位的提高與一胎化政策的達成為正向關係，缺一不可。在此思維邏輯上，對於婦女的保障便成為政策合法性的基礎之一，必須對其做出完滿的解釋。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說，這種態度可以說是相當特別的。

我們沒有證據認為這種態度一直是中共的一貫立場，畢竟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生育政策當中，這種論證尚不明確，但是在改革開放後所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中，婦女與國家互助關係不斷受到重視是可以肯定的。婦女必須提昇地位，提昇地位最堅決的宣示便是跟傳統父權文化嚴厲的切割，而一胎化政策正是一個表態的工

具¹⁸。傳統、多胎、早育、父權在此成爲了一個集體，而一胎化、晚生晚育、國家、現代就成爲了與父權相對立的面向。婦女必須服膺一胎化政策，因爲這象徵了一種現代化、新生活、男女平等的指標。

在這種龐大的文化想像之下，我們姑且先不論一胎化政策是否能夠帶來男女平等的結果，至少在政策動機上，中共是這樣明確宣示的。提昇婦女地位、打擊傳統父權與中國人口的控制，這三者將在一胎化政策的推行過程中畢其功於一役。而正因爲中共看見婦女在一胎化政策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許多的文件中，婦女群體的官方代表--「中華婦女聯合會」(婦聯)，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一胎化政策推行的初期，婦聯就必須向婦女群眾宣傳節育工作的重要性，1981年5月16日中發19號文件轉發全國婦聯黨組「關於兩個會議情況及1981年婦聯工作要點的報告」的通知，便指出婦聯的責任是根據中共中央「公開信」的精神和國家計畫生育政策，對婦女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¹⁹。

雖然在當時，大部份的官辦社團諸如共青團等等，幾乎都收到了這樣配合國家政策的指令，但是婦聯的角色在一胎化政策當中卻是越來越吃重的。這包括了在各級婦女代表大會中宣導國家理念，要求各級婦女組織配合動員之外²⁰，婦聯

¹⁸ 例如在1983年3月，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克服重男輕女的陳腐偏見」的文章中，提及「我們應當積極執行計畫生育政策，無論生男生女都要實行優生優育，要配合學校、社會，對青少年施以良好的家庭教育。我們要高舉婦女解放的旗幟，把我國廣大婦女從一切陳腐的舊思想、舊習慣、舊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之真正成爲我國進步和成熟的標誌。」(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¹⁹ 中共中央以中發【1981】19號文件轉發全國婦聯黨組「關於兩個會議情況及1981年婦聯工作要點的報告」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搞好計畫生育，逐步落實黨中央一胎化的號召，在這個問題上婦聯的責任是根據中共中央「公開信」的精神和國家計畫生育政策，對婦女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以避孕爲主的方法節制生育。及時反應婦女群眾有關這方面的意見和要求。提倡優生，做好獨生子女的教育工作。提高群眾實行計畫生育的自覺性，不搞強迫命令。

²⁰ 1983年9月2日，王震在祝賀全國第五屆婦代會召開時發表談話，各級婦女組織要大力宣傳和倡導獨生優生，優養優教；廣大婦女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精心培養教育好後代，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代比一代聰明、健壯，永遠充滿生氣。還必須批判那種重男輕女的封建殘餘思想，同侵害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行爲作鬥爭，堅決做到計畫生育、優生優育。(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的主要委員也在國家生育計畫委員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 1981 年的 19 號文件批准錢信忠、崔月犁、栗秀真（女）、顧秀蓮（女）等人為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而當時的栗秀真與顧秀蓮正是婦聯第四屆的常務委員（顧秀蓮於 2003 年擔任婦聯第九屆主席），之後的副主任如吳景春等人也均為婦聯常務委員。甚至在 1995 年針對貧困母親開始推行的「幸福工程」計畫，其組委會成員也包括了多名的婦聯常務委員（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婦聯在一胎化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所擁有的影響力可見一般。

雖然這樣的證據並不足以說明婦聯與國家機制之間的互動過程，以及婦聯對於政策所可能擁有的改變與修正能力，但是已經足夠讓我們更進一步的去理解政策背後的性別邏輯。婦女在政策啟動、執行與修正的過程中都被「納入」了，她的角色看似積極主動但卻又曖昧不清，因為雖然婦女可以在一胎化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扮演相當份量的影響力，但是這樣的影響力很明顯是來自於國家機制的授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女性在一胎化政策的過程中相當重要，但是何以重要？何處重要？婦聯和國家生育委員會的這種人事交錯重疊是否也是更直接的提示我們有一種更高層的思維在影響著政策脈絡的行進。婦女在政策演變的過程中並非是完全的自主，但是就作為國家公民的意義上來說，她也並非是全然的消極，因為在理論上，婦女在行動之前就已經先被定義為一個參與者了。

一胎化政策告訴我們，在簡單的宣揚男女平等背後有一套更為複雜的性別邏輯。它不斷的在重複一種中心思想，不管是在政策的動機、宣導亦或是實際執行的層面上，國家肯定婦女是政策執行的重要推力，而一胎化政策對於婦女健康或是地位的提昇都可以和國家發展需求做出正向的連結。

這樣的論述清楚明白、沒有曖昧，一胎化政策在國家發展需求上追求經濟發展、民族強健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性別訴求上將帶來婦女地位的提昇、將

康的保障以及經濟的更大自主空間。這二者論述的結合看似非常完美，母親與胎兒的健康將帶來民族體魄的強健，而婦女投入公領域勞動也將對國家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但就在這麼完美的論述結合中，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空前的性別災難。這是令人疑惑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對一胎化政策所提出的性別訴求加以審視，為什麼中共如此重視婦女，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第三節 中共的性別意識形態

中國的婦女問題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可以回溯至一個世紀以前的五四運動時期，婦女在當時動亂的政治環境下開始參與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不論是左翼、右翼，國民黨或是共產黨，在這種時代氛圍下開始萌芽的婦女運動一開始便註定帶有強烈的愛國意識，這是中國的婦女運動和其他已發展國家的婦運重要的不同（Zhang & Wu，1995）。強調女性的自由需要也必須附屬於國家的自由之下，這種境況類似於許多後殖民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

中國共產黨對於婦女問題的理解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奠基，早期的共產主義者認為不能夠單單通過婦女權益的爭取來解放婦女，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理解中國婦女的現況，認為必須藉由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婦女的解放才有可能得以實現（李靜之，2001）。共產黨對於女性問題的框架是建構於馬克斯主義、國家主義、以及五四運動女性主義的論述之上，他將婦女的受壓迫與私有制聯合起來，並將婦女的解放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最終結果（Zhang & Wu，1995）。因此，婦女的利益達到必須依附於整體人類的幸福達到，便成為其婦女理論的最核心意識。

雖然同樣是立基於馬克思主義而發展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卻有相當大的不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是一種思

潮，指的是運用馬克思唯物史觀、階級論等世界觀，以此為武器分析、抨擊父權宰制的女性主義論述，其本體是女性主義，在使用的同時也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與修正。而「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在江澤民的定義下則是指馬克思主義中對於婦女受壓迫的解釋（李沂靖，1998），它的指導意義遠大於思考，是社會主義國家解釋婦女處境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指標。

而中國的婦女理論雖然皆是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作為中心思想，但是卻會因為每代領導人對於中國目前的歷史發展階段定位而做出不同的重點理論修正。在毛澤東理論的影響下，任何理論必須考察當地情況做出適當調整，不能憑空嫁接（杜蒲、李玉玲譯：1992，55）。這種經過數次政治鬥爭所確立下的政治理論包含任何層面，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當然也如是。毛澤東強調婦女力量的能動性，配合其農民論述提出農村婦女是婦女解放的主體，並且只有階級解放和社會解放之後，才有婦女解放的可能性（白立強²¹）。

鄧小平時期強調經濟發展，反對毛澤東快速進入社會主義天堂的意志決定論，認為中國目前是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發展階段，並於十四大時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婦女理論也以此為當然主軸。因為在馬克思理論中婦女受到壓迫的情況是與當時社會的發展程度以及婦女投入勞動中的多寡密切相關，因此當鄧小平宣稱中國只是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時，婦女的解放也只能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馬焱，2001）。在初級階段當中，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經濟發展建設不足所以不能貿然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的注重經濟發展，所以在這種理論的定調下，婦女要獲得解放，其中心任務便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投入生產。婦女解放必須要與社會發展同步進行，當國家的生產力足以邁入社會主義天堂時，婦女才能和男性一起擺脫壓迫。因此，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婦女理論也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下，同時根據時代和中國社會變遷與時

²¹ 參見福建省黨史研究室。<http://www.fjds.com/h060806-2.htm>

俱進的理論，既要堅持婦女理論的普遍性、國際性，也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出發，展示中國特色（王宏維，2003）。這是中共國家機制對於婦女問題的核心思想，也是婦聯的指導方針（李秋芳，2000）。

江澤民時期一開始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並於 1990 年 3 月 8 日，在三八婦女節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做了「全黨全社會都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講話，從此，掀起了全國對於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研究熱潮（李沂靖，1998）。「講話」中提出將男女平等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國策，一方面因為中國目前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仍然存在一些婦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是一旦強調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便意味國家將會宏觀介入。2000 年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2002 年年底十六大「三個代表」載入黨章，這是江澤民執政晚期所提出的重要理論觀點。三個代表意指「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三個代表」作為指導性綱領，因此婦女運動的理論也很自然變成「根據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首先著力解決婦女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根據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倡導文明進步的婦女觀；將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與婦女群眾的具體利益結合起來」（蘆花榮，2004）。

而胡錦濤執政不久，在數次講話中仍然強調學習「三個代表」的重要性，在外交上繼續高舉鄧小平所提出的「和平與發展」。因此在 2005 年出席「紀念世界婦女大會十週年會議」開幕時，重申男女平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強調「和平是世界婦女事業發展的首要前提，發展是世界婦女事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合作是世界婦女事業發展的重要途徑。」²²並於 2005 年 8 月頒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強調「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國家採取必要措施，逐

²² 李詩佳，「紀念世界婦女大會十週年會議開幕，胡錦濤出席」，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29/content_3419006.htm

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制度，消除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²³」

雖然因為歷代領導人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的不同而有所轉換，但是婦女問題一直都是中共理論結構的一部分。中共重視婦女力量，並且將婦女發展視為總體發展之一，不管是動員也好、配合也罷，我們均不能否認中共在性別問題的處理上的確是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論述邏輯，一種性別的意識形態，而法案的提出必須要能夠合理化這套論述邏輯的發展。

在這種政治邏輯之下，婦女利益和國家利益是可以相結合的，因為婦女利益的前提是社會與階級的解放，而要促成這種解放最好，也是唯一的方式便是配合國家政策。當婦女配合一胎化政策時，她減輕了自身再生產的負擔能夠投入工作，而工作與經濟獨立便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中地位提昇的首要條件。就如同2003年所啓動的「關愛女孩」行動所言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婦女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為婦女解放和實現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依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為婦女解放和促進男女平等提供了基本保障條件。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首先，體現在眾多的已婚婦女從一生頻繁生育哺育子女、操持家務、服侍老人的家庭奴僕地位中解放出來，為走出家門的婦女學習文化知識、學習生產技能，提高自身科技文化素質贏得了機會和時間，使她們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和社區文化活動成為可能。」²⁴

然而，雖然這樣論述是如此完美，一胎化幫助婦女，婦女幫助經濟，經濟又可以回過頭來幫助婦女，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如果說這麼論述這麼完美，為什麼還會引發如此大的性別災難呢？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是兩

²³ 參見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PI-c/953097.htm>

²⁴ 「關愛女孩行動主要宣傳內容」，中國人口信息網。http://www.cpirc.org.cn/rdzt/rd_aids_detail.asp?id=4081

性共有的，如果說女性在一胎化的過程中受到了許多壓力，那麼我們必得要問，男性需不需要付出代價？男女兩性都要受到一胎化的限制，男女雙方都需要節育、避孕或是結紮，但是男性不會面對性別選擇生育的殺害或是遺棄。

在中共的性別意識形態中，我們看到許多對於如何提昇女性地位的論述，但是彷彿女性是受到一個不知所以的力量壓擠所以弱勢似的，即便是在「三個代表」倡導文明進步的婦女觀中，對於什麼是不進步的婦女觀也只有約略提過，「鞭撻落後腐朽的婦女觀，堅決同一切形式的損害婦女權益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盧花榮，2004）。彷彿只要婦女的經濟地位提昇，能夠投入工作，那麼一切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這種重視婦女利益、強調婦女工作，但卻將婦女等同於一個中性勞動客體是否正是國家發展需求與性別意識形態完美聯合上最大的不完美漏洞？

雖然，中共在「母嬰保健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七條，以及「關於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中，均嚴格規定禁止非醫學必要的胎兒性別檢查²⁵，國家似乎是作出了相當的努力在維持生育性別中立的立場。國家並沒有放任性別選擇性生育的發生，國家宣告了禁止的立場，也因此，做出選擇生育男孩還是女孩的決定權似乎便是個人的責任而已。當國家秉持著一個中性的立場，將男女雙方皆視為是中性的、經濟的、勞動的客體時，推動一胎化政策變成要跟傳統父權文化直接衝撞，而衝撞的犧牲者卻是女性。因為國家對於下一代的假設是性別中立的，對於生育主體的假設也是性別中立的，

²⁵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第三十二條，醫療保健機構依照本法規定開展婚前醫學檢查、遺傳病診斷、產前診斷以及施行結紮手術和終止妊娠手術的，必須符合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條件和技術標準，並經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許可，嚴禁採用技術手段對胎兒進行性別鑒定，但醫學上確有需要的除外；第三十七條，從事母嬰保健工作的人員違反本法規定，出具有關虛假醫學證明或者進行胎兒性別鑒定的，由醫療保健機構或者衛生行政部門根據情節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的，依法取消執業資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1/content_18943.htm；「關於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banshi/2005-10/24/content_82759.htm

但是國家的假設卻不是影響一切的主因，這便是性別意識形態跟國家需求之間的衝突，它們並沒有完美的主從與輔助關係，因為它們對於父權的反抗就是假設他不存在，後來的種種補強政策都像是突然發現事情並不圓滿的解決辦法，但是問題卻是出在一開始的盲點。因為國家是中立的，因為國家藉由種種禁止胎兒性別檢定的措施讓個人承擔性別選擇性生育的責任，國家藉由自清消除了國家的結構責任，如果父權依舊存在，那麼父權的責任也變得個別化而零碎化。既然在一胎化政策的性別邏輯中，一切都是很順理成章的發展，婦女與國家將會互相支持，但是這個順理成章卻是建立在對於生育中立的假設上，如果生育並不是中立的，那麼婦女和國家還可以有這麼圓融的關係嗎？

小 結

吳爾芙曾言：「身為女人，我沒有國家。身為女人，我不要任何國家。身為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王葳真譯，2001：153)關於女人與國家的關係，這種深刻的反省與疏離我相信不是唯一。女性主義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多樣化而常有曖昧不明的，但是她們都在企圖去指出某些我們習以為常於是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透過重新對於「現實」的再審視、批判，我們也就多了一些關於「更好的生活」的期許，甚至是趨近於自由的力量。

一胎化政策對於中國來說，他不只是改革開放的其中一個步驟而已，透過生育，透過人口結構的改造，中國其實想要生育出一個全新的自己，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因此生育政策本身就是一項價值標準的體現，國家在生育政策自明或是不自明的說出了自身的訴求，一個很隱晦、沉悶，但是關於人類繁衍的原始意義。

一胎化政策呈現出中國對於未來發展的想望，在總體目標的呈現上，中國希望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這個現代化包括了經濟上的富強以及民族的

強健，透過性別意識形態與之配合、合理化，女性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係被描述成合作無間的一種完美聯姻。國家重視女性的利益，重視女性的地位提昇，並且一胎化政策必須和此目的相輔相成才能夠達到目標，一胎化政策將會減輕女性再生產負擔使其經濟自主而達到地位提昇，健康保障，國家甚至必須全面性的重視婦女處境，包括教育、衛生。一方面而言這樣的訴求是維護了一胎化政策在性別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才能夠在實際上達成提高人口素質的目標，真正促進經濟成長，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但是在這樣的論述邏輯中，婦女彷彿只是某種貧困階級，而父權像是某種遙遠而破落的習俗一般與國家無關，國家完全不帶有父權的成份、想法、態度，而絕對清白，因為國家已經宣稱現代化，然而現代化是否就可以等同於已經去父權化？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否也有可能仍然帶有父權的成份？如果國家已經跟父權毫無關聯，但是父權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卻依舊存在，那麼這個問題與責任是否應該由個別做出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家庭與父母來承擔？更進一步，如果婦女確實可以像是受壓迫的勞工階級一般，只需要經濟上的改善便能達成地位的提昇，但是我們仍必得質問，如果婦女可以被視為一個藉由投入生產、經濟地位提高便可提昇地位的勞動客體，那麼她的勞動是回饋給誰？這種再生產的解放是一胎化政策的目的還是附加的結果？女性真的有因此而得到了實質上的利益嗎？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絕對化的態度是否將會使得一胎化政策推行的過程當中，婦女必須獨自對來自私領域的龐大傳統父權文化壓力？在一胎化政策中國家發展需求與性別意識形態的聯合中，是否只是留了一個最大的衝突點給女性獨自去承擔，因為它們一開始便假設當國家已經現代化便不復擁有父權的腦袋。